

中国目录学七十年:发展回溯与评析

柯 平 刘旭青

摘 要 本文将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与共时性评析相结合,从外引与内生、分离与衔接、机遇与挑战、单一与多元、独立与依附、重建与迷失、传统与现代七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目录学的发展进行回溯和评析,勾勒出七十年间中国目录学发展的路径及框架。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认真反思,重构中国目录学理论和体系。参考文献 36。

关键词 目录学 现代目录学 中国

分类号 G257

70 Years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Analysis

KE Ping & LIU Xuqing

ABSTRACT

In 1949,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reated an unprecedente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opened a new chapter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in the past 70 years, combines diachronic description with synchronic analysis, and outlines its development path from seven asp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vides directional guid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by analyzing the new environment faced by bibliography in the new era.

First, the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line that runs through the 70-year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bibliography in China, and even the whole process of bibliography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bibliographic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learning and introducing advanced theori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 to discovering and recognizing oneself. In the 1990s,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bibliographic theory system based on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movement law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the 70-year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Second, Chinese bibliography has undergone a real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bibliography to modern bibliography in the past 70 years. Bibliographic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have also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aggregation to scientific separation. However, in the new environment, there is a problem that Chinese bibliography can not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 after separation. The field of bibliographic practice calls for practical academic research guidance. Third, the activ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ibliography is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renewal of bibliog-

通信作者:刘旭青,Email:hbuliuxuqing@163.com,ORCID:0000-0002-8868-7358(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U Xuqing, Email:hbuliuxuqing@163.com,ORCID:0000-0002-8868-7358)

raphy knowledge structure, opens up a new growth point of bibliography, and challenges the orient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discipline. Fourth,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methods of bibliography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from singleness to pluralism.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of bibliograph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two transmutations. The multiple research paradigms have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modern bibliographic research in a synchronic way.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s and general methods of bibliographic research have become more scientific. Fifth, the dependenc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ppeal to the independence of subject. The ambiguity of subject ownership and the dispersion of knowledge system of bibliography all lead to the ambiguity of subject orientation of bibliography. The autonomous consciousness of bibliography subject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social ideology and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Six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bibliography in New China has been rebuilt rapidly, but gradually los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discipline transformation. This is accompanied by the drawbacks of modern subject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academic spirit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Sev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bliography needs to absorb and integrate the fine traditions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Numerous valuable achievements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have not been properly developed and protected. Modern bibliography will lose its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source if it los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while the value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will not be diminished whether it is inherited or not. 36 refs.

KEY WORDS

Bibliography. Modern bibliography. China.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目录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开启了目录学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漫长发展岁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而相对于古典目录学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而言,现代目录学在此段时期则经历了曲折与磨难、高潮与低落。这其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动荡与变革、现代科技的助推与冲击,它既受到国际化的深刻影响,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色。如今,目录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处于转型之中。文章回顾和总结了目录学七十年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期为目录学的未来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1 外引与内生:目录学理论现代化

新中国目录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环境下目录学理论如何现代化。20世纪初西方现代分类法与图书馆目录的传入使中国目录学告别了

古典时代,伴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旧学与新知的交融,中国目录学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征程。在此期间,尽管探索了一些现代新方法,但遗憾的是,现代目录学理论并未建立起来。

外引为目录学理论现代化提供了捷径。新中国成立之初,目录学研究视野转向苏联。处于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先进的书目工作经验对中国书目事业兴起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示范作用。书目实践水平的提升必然要求现代化的理论作指导,而中国目录学界尚有一批基本理论问题亟待解决。苏联向来有重视理论问题探讨的优良传统,二战结束后即出现目录学基础理论的大讨论,这场理论热潮也迅速蔓延到中国,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形成了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首次高潮,遗憾的是这一高潮很快就被“文革”所终止。改革开放后,目录学界将重点转向学习国外发达国家,一方面,“苏联热”的余温继续向目录学界渗透,苏联“书目情报”概念引进就是一例;另一

方面,思想的解放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使研究者不再局限于苏联目录学的束缚,英美等发达国家目录学成为学习借鉴的主对象。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基本认识,目录学理论现代化的完成根本在于内生。中国目录学界首先确定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目录学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之后,目录学界继续开展基础理论的大讨论,并形成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二次理论研究高潮^[1]。在这次高潮中,理论界展开了分化与综合的多重探讨,在研究对象的认识、方法论的革新、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学术史的梳理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突破^[2],开启了中国目录学理论现代化的新篇章。一是以彭斐章、谢灼华等为代表的目录学家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指导思想中探寻学科的理论基础,提出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将目录学理论研究引向学科本质和更深的规律层面,并迅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3]。二是书目与情报相结合,适应了目录学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书目情报”也担当起目录学矛盾双方的理论桥梁。此后,基于中国书目实践发展的特殊需求,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现代目录学继续向前推进,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与管理等体系逐步完善,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4],这无疑是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七十年中取得的最突出的成绩。三是书目控制理论、文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新的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迅速兴起,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

在学术转型的变局下,包括目录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都经过了由学习苏联、学习西方到发现与认知自我的历程。外引与内生式的融合发展是贯穿与统领中国目录学七十年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目录学现代化的主线。此进程中,西方现代、中国传统与当下三重因素融为一炉,几代学人对不同因素的多重关照交替显隐,无论是对哪一维度的拉近与推远,都呈现出目录学理论研究鲜明的时代特征。站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反观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受到了国外新思想很大的影响,反观其对世界目录学的贡献,除去古典学术在东亚文化圈早已成型的历史影响,中国目录学的创造性输出乏善可陈^[5],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2 分离与衔接:学术研究指导书目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目录学发展在理论现代化的同时,走了一条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逐步分离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受苏联目录学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学术研究曾一度超前于书目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20世纪50年代,国家书目工作体系建立,在相应的书目方法论指导下,全国、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至60年代汉字检字法方案就有四、五十种之多^[6]。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索引、书评、文摘等工具性二次文献编纂的需要,目录学分化产生了相应的分支学科,书目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相生相成、耦合互动的良好态势^[7]。从1949至1992年编辑的书目索引共7682种^[8]。90年代,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建立,最终实现了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在科学层面上的分离,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指导书目实践^[9]。

究其原因,这种实践与研究的分离是20世纪上半叶目录学的沿续,在“西学东渐”的学术浪潮下,一批新、旧目录学人猛然意识到中国书目实践的保守与学术研究的落后,尝试改变中国目录学学术研究附庸于书目实践与社会需求的现状。从思想根源上看,与现代西方学术推崇研究主体和客体二分思维真理观,主张构建起分别探讨客观实在与主观认识的科学理论,进而实现学术研究从书目工作实践中的有效分离^[10]不无联系。然而,当实践界沉浸于书目编纂成果远超古人、学术界欢庆理论研究一片繁荣的时刻,超出目录学预想的新环境已悄然来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伴随而来的还有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服务于纯学术研究的目录学在以效益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价值体系下变得不合时宜,建立不久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在新的信息革命冲击下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这种形势之下,原始资料获取的便利引发了人们对书目编纂必要性的质疑,随着计算机检索技术和搜索引擎等工具的突飞猛进,人们又开始质疑书目方法的科学性。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目录学界一时忙于应付数字、网络新环境,难免表现出饥不择食,学术范畴和核心概念脱离了对书目工作经验的总结,转而研究信息、知识这些新的时代概念,一味以理想化的体例建构着理想化的理论框架。

中国目录学在七十年间经历了从古典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的真正转型,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也从传统聚合状态走向科学化的分离。然而,在新的环境下目录学却出现二者分离后无法衔接的问题,书目实践未能呼吁出切合实际的理论,已有理论因脱离实践的支持而流于空谈,两者分别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独立运行。如今,目录学知识仍然广泛应用于书目工作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关照的失衡与脱节,不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而是理论远远落后于数字、网络新环境下的书目实践,时代强烈呼吁契合实践甚至高于实践的成熟的理论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学术本体论的主、客一致性,而处于经验总结时期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从未觉察到将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分离的必要性。因此,现代目录学必须坚持学术研究指导书目实践,有必要回归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

3 机遇与挑战:目录学主动应用信息科学技术

科技向来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目录学在七十年书目实践和学术研究所处的环境中,变化最明显的要素是信息科学技术。开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

书目信息领域的作业和交流方式,对目录学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信息科学技术催生目录学知识结构的更新,开辟了新的学科增长点。首先,在技术应用层面,计算机技术使图书馆采、分、编、流走向自动化,卡片目录和目录柜被馆藏数据库和 OPAC 所取代, MARC、网络通信技术让书目资源共享、图书馆联合编目成为可能。其次,在研究内容层面,技术环境的变化直接带来网络信息资源的类型增加,迫切需要对网络书目文献资源展开有效的揭示与报道,由此产生了网络资源导读、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控制与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等相关研究。再次,在理论体系层面,信息技术理论与目录学理论的结合,产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例如网络目录学、数字目录学等^[11],促进了目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处在数字、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信息科学技术为目录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一批研究者纷纷认为目录学在信息时代大有可为,以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充分发挥其“致用”传统。

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技术对目录学学科定位提出挑战,目录学更新与脱节的矛盾凸显。一方面,目录学在书目实践中的地位下降。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代表的分类法的确定和统一,让目录学的类例方法直接失去了研究和应用的契机;计算机联合编目的实现,让目录学失去了图书馆编目这个天然的生存阵地,也就失去了在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12];而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及快速发展,迅速取代了书目的检索功能。另一方面,在主动适应与被动迎合之间,目录学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目录学领域的编目方法被信息组织所取代,书目检索法代之以情报检索语言,新兴的书目计量学与书目控制论也被情报学中的文献计量学和情报控制论抢先^[13]。这时,学界和实践界开始感到忧虑,出现了唱衰目录学的论调。

目录学界对信息科学技术的响应并没有做到及时和精准。在计算机编目最初兴起的关键

十年,“文革”的政治风波已让目录学界索莫乏气。之后,改革开放与互联网技术几乎同时到来,慨叹终于跟上最新科技潮流的一代目录学人把信息科学技术看作目录学发展的新机遇,适时提出了网络目录、数字目录等新概念,但从现实发展来看,尚缺乏深入扎实的后续系统研究,网络、数字目录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正当目录学急于寻找新的时代定位与存在感的同时,21世纪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更是让目录学界猝不及防,全无招架之势^[14]。书目信息内容和交流中出现的任何新常态、新业态和新服务都是之前目录学所没能遇到或预测到的新挑战。此时,却极少有人关注目录学与最新信息科技的关联,探寻目录学理论新的突破口。一些目录学人表现出的与其说是冷漠,更多的是逃避。然而,不断涌现的新挑战不会因为逃避而减少,若一些变革注定要发生,最理性的态度就是直面危机,即站在这场颠覆性变革的最中心,对学科的最新发展与走向展开创新性思考和严谨的科学论证,前置应对措施和转型机制,主动应用信息科技以取得目录学发展新的突破。

4 单一与多元:目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转型

七十年来中国目录学发展所经历的理论现代化、书目实践要求学术研究指导以及目录学面临信息科技的机遇与挑战,都是目录学发展的显在和必然,而进一步深入透视可发现,目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都已悄然发生了转型。

中国目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是一条从单一到整合的折中路线。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目录学主流范式经历了两次嬗变。一次是传统目录学单一的史学范式转为现代目录学的学理性范式,此次转变开始于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之后依旧延续,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建立才算正式完成。另一次是在20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下,由学理

性范式转向技术范式。因中国目录学学理构建几乎横跨整个20世纪,两大范式的形成期和转型期有很大的交集^[15]。作为现代目录学前科学的古典目录学,既是新范式构建的一种羁绊,也是一笔财富。一方面,现代目录学试图挣脱传统史学范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合理吸纳此范式下所构建的目录学史实^[16]。最终,古典目录学的史学范式只是作为核心模块之一融入了现代目录学的学理性范式体系之中,并持续发挥作用^[17]。技术范式的出现迎合了书目实践的需要,但面临难以融合古典目录学人文属性的困惑。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的兴起为二者的融合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可见,范式的革新并不是旧有范式被完全颠覆和取代,也不是试图构建无所不包的统一范式,而是在充分认识各种范式的适用性与局限性的前提下,以更广阔的视野在范式之间合理对话和取舍。审视当今目录学研究,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早已被打破,多重研究范式以共时性的方式在现代目录学中同时凸显。

中国目录学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多重转型。传统目录学向来强调致用性,过于浓厚的经验描述色彩遮掩了自身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创设,曾长期停留在类例、小序、解题、别裁、互著等实践层面的编纂方法^[18]。新中国成立后,目录学的科学化重点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首先,哲学领域方法论的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曾一度成为指导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唯一哲学方法。其次,一般方法层面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学界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探讨,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较为系统地阐释研究方法的论著,研究者跳出他们固有的知识体系,广泛借鉴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其他科学领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先进的方法和范式引入目录学领域,如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数学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方法的渗透和移植带来了学科新的增长

点,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书目控制法等发展成为目录学领域独树一帜的专门研究方法,并产生了一批相应的分支学科。20世纪90年代之后,实证研究在目录学领域日益显现,历史研究法和逻辑方法(归纳、分析、综合)等广泛适用于文史领域的传统定性研究方法比例下降,目录学数学化趋势明显。

中国目录学研究方法在冲突争持与反拨重构中滋长,继而实现批评范式的有益转换。研究方法可以互补却无法完全取代,只能改变原有方法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目录学研究方法由摸索探求走向自觉,逐步实现对其合理性的认知。在科学哲学的影响下,书目编制法与研究方法在此时期都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目录学吸收和引进新方法的时差越来越短^[19]。同时,目前目录学领域的方法和方法论体系仍有待于完善,需从各种层次、思维形式对研究客体进行深切的系统考察,关注在趋于动态的科学结构下如何实现方法和方法论的有效融合。

5 独立与依附:目录学主体性呼唤

随着目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转型,目录学学科范畴、学科归属等问题凸显。中国目录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阶段都带有很强的依附特征。关于一门学科的称呼问题,古典目录学历来就有“校讎”与“目录”之争,其实是关于目录学学科范畴的争论^[20]。现代目录学的百年历程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却始终未能跳出西方目录学的藩篱。一些研究者热衷于引进西方时髦的理论,将西学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来框架中国目录学,自身却图强乏术^[21]。面对西方文化、现代科技的强烈攻势,中国目录学在保持其学术自主性上的能力和努力是有限的,往往陷入用自身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很明显,在他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很难充分表达自身的学术理念和传统。

学科归属的不清晰带来目录学主体定位的模糊。以中国当前的学科划分,具有二级学科

建制才能成为独立的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目录学作为三级学科分布在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二级学科之下,前两者对应的是文、史领域的古典目录学,后者则将古典和现代目录学全部涵盖。学科体系中定位的不明确与学科的从属地位必然会让目录学发展受到限制,引起研究视角和话语体系的分野。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是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的,情报的概念引入目录学领域,大大拓展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对目录学的新要求。同时也应该看到,将目录学与情报学的交叉领域作为学科的研究基点,一定程度上酿成了现代目录学主体定位的模糊。

目录学分支体系的拓展带来学科母体知识体系的分散。现代目录学的产生与图书馆学并世同时,20世纪80年代,目录学曾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并称为图情领域的三大学科,并作为其余二者的学术源头和基础而被认可。此后,图书馆学及后起的情报学、档案学等纷纷借鉴目录学的有益成分,拓展了本学科的研究范围。而目录学却因自身的内容、方法被其他相邻学科所吸收,研究范围逐渐变窄。到20世纪90年代,索引学、文摘学、书评学等分支学科的独立,致使目录学主体的“致用”成分进一步弱化。此时,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目录学跌入了萎靡的状态,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

目录学的自主意识易被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所左右。20世纪50到70年代,目录学被迫冠以阶级性,处于“泛意识形态化”或“泛政治化”暗影的笼罩下,受“左”的思想的禁锢与僭越,目录学研究被迫附庸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学术主体的自主意识丧失殆尽。这一时期,目录学所遭受的批判与清算不是对目录学本体的反思,而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对旧学术的鄙夷。学术独立的最大特点是不盲从,中国目录学在七十年间面对接踵而至的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社会认识论、实证主义等种种学术思潮和学说,始终处于渗透与反渗

透、影响与反影响的挣扎境遇之中^[22]。目录学要求客观地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势必期待对主体的积极自省和对客体的全面审视。

当然,学科并不是只有愈独立才愈有地位。不能忌讳目录学作为应用、辅助学科的存在,更不能回避目录学在编目实践、人才培养上依附于图书馆、图书馆学或其他相近学科的现状。科学理论具有其发展性或变异性,当下的目录学研究现状只是当前认识水平的反映,一定时期的科学理论总会被后来的新理论所修正或替代,就像古典目录学理论被现代目录学理论所充实那样^[23]。向使目录学真的被吞噬、瓦解,消失的也只是目录学的学科建制,而不是目录学的思想和方法,目录学知识同样会因其致用价值而被其他学科广泛需要。

6 重建与迷失:学术共同体支撑学科发展

比目录学学科范畴、学科归属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人才问题,需要新的学术共同体支撑学科发展。中国目录学有代不乏人的学术生态环境,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重建目录学学术共同体,并且很快就恢复了目录学教育体制,由旧中国转型和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目录学人共同搭建起了学科人才的大厦。虽经历“文革”的摧残,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迅速成长起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目录学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目录学博士点的设立,将目录学教育推向一个高峰,呈现出以北大、武大两大集团研究力量为主的学术群体,至今在目录学界发挥着重要作用^[24]。

在学科转型的境遇下,重建之后的学术共同体得而复失。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开始,紧随目录学教育高峰而来的却是学科教育的萎缩,目录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和核心地位下降,高校目录学核心课程被纷纷缩减,目录学慢慢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平台和门路。此外,国家及省、市级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25],目录学刊物和专栏

等各级、各类学术团体或组织也纷纷减少或停止活动,协同性的学派式研究变为伶仃的个体性探求。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老一辈目录学家的退出,目录学界失去了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学术带头人。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又出现转向和游离,在与前贤新旧交替的代际传承中出现了“代沟”,目录学学术梯队和人才链濒临断层的严峻局面^[26]。至此,只剩少数研究者在殚精竭虑地孤军奋战,其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学派之间争鸣的理想场景未能很好地延续。

中国目录学先天性的私学色彩未能得到现代学科教育的继承。私人目录是古典目录的三大重要流派之一,即使是到民国时期,个体书目工作仍然是整个书目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于民间最真实的读书治学的期许正是目录学始终兴盛的可靠保障,私学色彩也让目录学一贯保有底层继承和创新的活力。审思目录学近七十年发展史,目录学的社会化并没有助推民间学术的普及化,目录学研究从自由、分散的切实需求状态走向体制化的褊狭约束。由于现代教育机制的局限性,学科教育一旦缺失,就直接切断了目录学的后备人才来源,单纯依靠学科人才的培养令目录学失去其广泛的社会根基。

当下目录学人欠缺传承与创新的学术精神。不可否认,现下学术评价模式的片面化给个体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功利主义的心态让他们既缺乏对学科的责任和热情,也逐渐遗失专业交流和参与对话的能力。若抛开教育体制的发展和变迁对学人具体科研任务的要求,青年学者欠缺为学术而学术的绝对精神追求,学术话语中逃避、不屑、忽视等浮躁心理远大于重建、传承、创新、协作等精神追求,多数人并没有把目录学作为唯一或主要的研究方向^[27]。然而,一个学科若没有青年人的坚守,失去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将一切放在实用主义的天平上衡量,必然会因自轻自贱而丧失学科的学术地位和价值^[28]。

7 传统与现代:从古典目录学传承看目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七十年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与特征,指向一个最有意义的学科命题:继承与发展。现代目录学未能充分吸收和融合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导致目录学走向浅薄化。中国目录从产生之初就不是一项简单的著录工作,“目录”一词包含对文献内容和载体的双重考量,它依托于古典文献而负载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更多的是致力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29]。受政治体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肯定其学术价值而否定其思想价值,将其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器具,这显然是对文化的片面理解^[30]。而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式的判断也不免流于皮相,古典与现代融通口号也多化为空谈^[31]。目录学界的科学革命,让以文史为主要话语形态、富有古典学术气质的传统学术,让位于以科学叙述和逻辑分析为特点的现代科学。古典目录学被生硬地嫁接在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之中,离开史学和文学的根基之后剩下的只是方法和形式的外壳,对传统价值的继承也只能停留在口头的祭奠。现代目录学如果失去古典目录学的优秀传统就失去其内涵和思想源泉,而古典目录学的价值则不会因其是否得到继承而损减^[32]。

两千余年目录学史留下的无数有价值的目录学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开发。一方面,七十年的古典目录学编纂和理论成果相较于丰富的目录学遗产,显得极不协调。七十年来正式公开出版的新编古籍书目,除《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为数不多的凝重之作外,大多流于“部次甲乙,条别异同”式的花名册,毫无“推阐大意,疏通伦类”之义,并未能继承古典目录学解题、大小序的优良传统。而对古典目录学的理论研究更显滞后,改革开放之前竟无一部崭新的古典

目录学理论著作问世。另一方面,古典目录学优秀成果及古典目录学家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在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浪潮下,古典书目曾作为“封资修”的书籍被焚毁,王重民、顾廷龙等一批著名古典目录学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摧残,政治环境的骤然转换几乎将古典目录学雪藏^[33]。

目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带来古典目录学传统不传、创新乏力。古代学术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创造了培养通才型学者的文化环境。现代科学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化带来学人知识领域的狭窄,目录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变成了服务于图书馆编目的技术人才,由学术向技能的转变是现代目录学的一大失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图情界学人普遍欠缺文史功力,文化的断层让青年学人逐渐丧失了研究古典目录学的能力和动力。近年来,图情界学人更是将古典目录学逐渐遗忘,而在此时,文史领域纷纷捡起了目录学。对古典目录学话语权的放弃,只能让自身变得更加孤立。

若将古典目录学的退守简单归咎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片面且不符合实际。目录学走向现代化,同样拓展了古典目录学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方向,古典学术与现代科技结合有着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代人对目录学史的研究其实是对历史的重构,对古典目录学文化价值的重估不是把传统文化因素视为已经定型的范式,而是要实现创造性的理解和对话,达成历史与时代的共向交汇,阐释符合社会发展的现代价值^[34]。

8 结语

回顾新中国七十年目录学的发展史,现代目录学的基本理念得以重新树立,目录学走向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在此期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客观条件使其始终处于冲突与碰撞、困扰与迷惘的境遇当中。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新问题不断涌现,

这要求目录学及时反思、调整自我,以时刻保持与文本、时代的良好对话^[35]。目前,目录学学科的萎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几个人振臂高呼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录学再次步入需要认真反思和重构目录学理论与体系的阶段。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目录学的未来模式也很难预测,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在一

定时期内解决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这种不完美是学科转型期所特有的^[36]。经历了七十年的磨练,中国目录学已经具备了国际化视域的能力和条件,其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引进域外目录学的多少,而是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道路,以不辜负时代给我们当代学人的重托。

参考文献

- [1] 贺修铭.20世纪目录学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比较[J].图书馆,1994(5):14-18.(He Xiuming.Two climaxes of bibliography research and their comparison in the 20th Century[J].Library, 1994(5):14-18.)
- [2] 陈光祚.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对目录学对象的再认识[J].图书情报工作,1990(1):1-7,30.(Chen Guangzuo.Bibliography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ordering, measurement and orientation of bibliographic flow: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of bibliography[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90(1):1-7,30.)
- [3] 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8-10.(Wuhan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Bibliographic Introduction* Writing Group.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8-10.)
- [4] 彭斐章,彭敏惠.反思与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目录学研究[J].图书馆论坛,2008(6):5-9,43.(Peng Feizhang, Peng Minhui. Pondering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J]. Library Tribune, 2008(06):5-9,43.)
- [5] 范凡.从目录学到志学——20世纪前期目录学在日本的研究与发展[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6):117-129.(Fan Fan.From Chinese bibliography to Japanese bibliography: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in Japan befor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6):117-129.)
- [6] 杜定友.比较查字法[N].光明日报,1961-06-14(03).(Du Dingyou.Comparative method for character retrieval [N].Guangming Daily, 1961-06-14(03).)
- [7] 倪晓健.文献检索与利用著作体例十二种[G]//倪晓健.目录学与文献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145-149.(Ni Xiaojian.Twelve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utilization styles [G]// Ni Xiaojian.Bibliography and literature utilization.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8:145-149.)
- [8] 柯平.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234.(Ke Ping.Research on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eory [M].Beijing:Catalogs and Documentations Publishing House,1996:234.)
- [9] 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目录学(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Peng Feizhang, Qiao Haoqin, Chen Chuanfu.Bibliography (Revised Edition) [M].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3:1.)
- [10] 王猛,郑建明.从目录学的致用性看当代目录学的发展[J].图书馆杂志,2013(12):14-17,41.(Wang Meng, Zheng Jianming.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ity [J].Library Journal, 2013(12):14-17,41.)
- [11] 柯平.数字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发展方向[J].图书情报知识,2005(3):18-22.(Ke Ping.Digital biblio-

- graphic scienc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J]. Document, Informaiton & Knowledge, 2005(3):18-22.)
- [12] 乔好勤,李锦兰.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J].图书与情报,2001(3):2-5,12.(Qiao Haoqin, Li Jinla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01(3):2-5,12.)
- [13] 尚志明.目录学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图书情报工作,1994(5):6-10.(Shang Zhim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ibliographic theory research[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94(5):6-10.)
- [14] 石进,胡雅萍,李益婷.大数据时代目录学的新使命[J].图书馆学研究,2019(6):49-55.(Shi Jin, Hu Yaping, Li Yiting. New mission of bibliography in the age of big data[J]. Researches on Library Science, 2019(6):49-55.)
- [15] 谢灼华.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发展论纲[J].图书情报论坛,1994(3):2-8.(Xie Zhuohua. An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theory in ancient China[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Tribune, 1994(3):2-8.)
- [16] 王锦贵.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60-263.(Wang Jingui.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4:260-263.)
- [17] 王心裁.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J].图书馆,1995(5):13-16,12.(Wang Xincai. From mastery to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chapter, examining the mirror source and course" to bibliographic control theory[J]. Library, 1995(5):13-16,12.)
- [18] 朱天俊.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24-29.(Zhu Tianjun. Concise course of applied bibliography[M].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1993:24-29.)
- [19] 李国新.论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的哲学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101-106,100.(Li Guoxin.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atalogue structure system[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91(4):101-106,100.)
- [20] 柯平.文献经济学[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21-26.(Ke Ping. Documentation economics[M]. Beijing: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1:21-26.)
- [21] 全根先.中国近代目录学理论研究之学术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7-52.(Quan Genxian. Academic heritage of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theoretical bibliography[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3(3):47-52.)
- [22] 张洪元.关于目录学研究的一点想法[J].图书馆,1999(1):9-12,25.(Zhang Hongyuan. Some thoughts on bibliography research[J]. Library, 1999(1):9-12,25.)
- [23] 夏南强,胥伟岚.中国目录学的回归与重构[J].图书情报工作,2017(14):34-39.(Xia Nanqiang, Xu Weilan. Repres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7(14):34-39.)
- [24] 柯平.中国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J].图书馆杂志,2005(3):5-11,4.(Ke P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bibliography in China[J]. Library Journal, 2005(3):5-11,4.)
- [25] 乔好勤.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缘起[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2):1-4,7.(Qiao Haoqin.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cation Group on Bibliographic Studies[J]. Guangdong Library Science Journal, 1988(2):1-4,7.)
- [26] 司莉,彭斐章,贺剑峰.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1(9):21-24.(Si Li, Peng Feizhang, He Jianfeng. The organiz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ic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1(9):21-24.)

- [27] 徐建华.目录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者心态及其他[J].图书情报知识,2005(3):9-11.(Xu Jianhua.Discipline orientation, researcher's psychology and other aspects of bibliography[J].Document, Informaiton & Knowledge, 2005(3):9-11.)
- [28] 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1(1):4-12,35.(Wang Zizhou.Sixty year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J].Document, Informaiton & Knowledge,2011(1):4-12,35.)
- [29]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44-56.(Lai Xinxia.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bibliography[M].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1:44-56.)
- [30] 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306-308.(Zhou Jiming.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M].Nanning: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1:306-308.)
- [31] 程焕文.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判[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4):14-20.(Cheng Huanwen.Inheritance and abandonment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tradition: criticism on "Distinguishing the academic chapter, examining the mirror source and course"[J].Library Work and Study,1996(04):14-20.)
- [32] 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J].图书与情报,1993(1):36-41.(Wang Guoqiang. Outline of bibliographic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J].Library and Information,1993(1):36-41.)
- [33] 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2):63-78.(Wang Zhongmin.On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J].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Humanities),1964(2):63-78.)
- [34] 傅荣贤.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J].图书馆,2010(3):35-38.(Fu Rongxian.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bibliography[J].Library,2010(3):35-38.)
- [35] 陈传夫,罗博,冉从敬.目录学的时代性——教学研究体会[J].图书情报知识,2014(3):14-20.(Chen Chuanfu,Luo Bo,Ran Congjing.Temporal spirit of bibliography:experienc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J].Document, Informaiton & Knowledge,2014(3):14-20.)
- [36] 彭斐章,贺剑锋,司莉.试论21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J].图书馆杂志,2001(5):2-5,28.(Peng Feizhang,He Jianfeng,Si Li.Bibliographic study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general characters[J].Library Journal,2001(5):2-5,28.)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刘旭青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收稿日期:2019-07-25)